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21.03.003

革命叙事视野下中共反对善后会议的斗争

丁君涛,叶晓东

(湖北经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205)

摘要:中共对于善后会议的态度并不是一以贯之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支持再到反对的转变过程。随着善后会议真面目的暴露,为了抵制善后会议,国共开始联合起来共同推动国民会议促成会,在此过程中,中共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不仅锻炼了其群众动员的能力与水平,更促进了人民的革命意识新觉醒。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考察中共此次的斗争活动,不仅能够全面地观察斗争的过程,更能够对中共的斗争方式有微观的认识。中共在反对善后会议的斗争过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经受了考验,体现了坚定的斗争立场和较高的斗争水平。此次斗争不仅是国共合作以来,中共对政治活动的一次重要参与,更是对其综合能力的一次验证。善后会议各方的斗争与妥协,可以证明革命叙事仍是探究、表达中国近代史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中共;国共合作;善后会议;国民会议促成会;革命叙事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21)03-0019-06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叙事有取代革命叙事的趋势。受此影响,过去二十年来,研究“反帝反军阀”的理论模式遭到冷遇,如作为北洋军阀延续统治的一次重要会议——善后会议,虽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学者们大多是从政治参与的角度对善后会议予以认知^[1-9],也有个别学者简要探讨了中共与善后会议的关系^[9],而中共作为反对善后会议的重要一方,研究中缺乏基于中共革命的视角,则显然不够圆满。段祺瑞决定召开的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为名^[10],企图恢复封建军阀政治,从而招致了多方进步力量的反对。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投入了这场反对善后会议的斗争,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革命叙事的视角观察这一活动显然意义重大。

一、中共早期政策的转向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发生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参加善后会议,中共很快予以反对,认为北方政局所发生的不过是封建军阀的内讧。时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赵世炎近距离观察了这场政权更迭,他认为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不配称革命,斗争双方背后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博弈。“这次北京事变明明是日法帝国主义外交之胜利,明明是日法与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战争,继而因日法援助张作霖军事而胜利,又运用外交手腕而得胜利,结果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法妥协,弄成了现在的局面。”^{[11]149-150}

在中共看来,冯玉祥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新工具。10月29日,陈独秀发表《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一

收稿日期:2021-04-04

作者简介:丁君涛(1985-),男,湖北仙桃人,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叶晓东(1976-),男,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党史党建。

文称：“此次北京政变，显然使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这个新工具比旧工具更柔顺服从一点，更得中国的所谓‘舆论’赞助一点。”^[12]彭述之提醒人们，不要对冯玉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对这次之北京政变，绝无何等希望之可能，也绝没有向英美帝国主义的新代办冯玉祥发表要求之必要。”^[13]他认为冯玉祥在此时请中山先生北上，显然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一种阴谋。蔡和森甚至认为，“中山先生现在若上午入北京，我可断定他在革命上的信用下午便要破产。”^[14]

中共党内有部分同志对于中山先生北上持支持的态度。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的发言中回顾了党内对孙中山北上问题的意见分歧。“广州的同志和一部分俄国同志认为孙中山北上上是必要的，但是中央反对这一点。广州的同志认为随着孙中山的北上，革命运动可以扩展到广东范围以外。”^[15]

中共之所以反对孙中山北上，最主要的原因是担心他可能与各派封建军阀妥协。中共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在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中，与各方的封建军阀来往非常密切，特别是与北方奉系的关系更让中共警觉。

10月17日、11月4日、11月7日、11月8日，孙中山电告段祺瑞等北方封建军阀，告知自己将要北上。电报中对段祺瑞和冯玉祥多有恭维，“公老成襄国，定有远谟”，“芝老被推统帅，就近统率联军，遥祝指麾若定，迅奏全功”，“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16]251-291}此类无原则立场的陈旧用语颇有旧时代的习气，自然引起以鲜明革命立场著称的中共的不满。11月7日，赵世炎在《政治生活》上撰文对此表达了担忧，“我们尤其恐怖的是：倘若中山先生完全为妥协而来，抛弃了宣言与政纲，至于中国民族运动之堕落。”^{[11]145-148}

共产国际在华代表们认为中共的担心不必要，理由有二：第一，与中共对冯玉祥的判断不同，他们认为冯玉祥与张作霖、吴佩孚等封建军阀有区别，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假以时日他会站到革命一边；第二，北京政局的变化给国民党提供了发展的好机会，如果错失此次机会，会削弱国民党的长期影响力。共产国际代表们对中共的批评，再次反映了他们轻视中共，以国民党为中心推动中国革命的工作方针。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按照自己的认识规划中国革命进程，而不管革命由谁来主导。

孙中山北上决心已定，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压力下，中共开始调整对孙中山北上问题的政策。以召开国民会议的方式推动中国民主政治进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是中共一直以来坚持的主张。孙中山谋求国民会议的促成，使得中共逐渐改变立场。1924年11月10日，在从广州出发北上之前，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明确把召开国民会议作为他北上的目标之一，并提出在召开国民会议之前先召开预备会议^{[16]294-298}。这一表态，无疑让早就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中共方面感到满意。

孙中山北上后坚持既定原则，没有与封建军阀妥协，亦未参加所谓的“和平会议”，进一步打消了中共方面的疑虑。赵世炎认为，“中山先生此次北来的意义，展开了中国民族的生机。”^{[11]162-163}恽代英认为，“孙中山先生的用意是很深远的：他要唤起全国民众打破一切垄断包揽的局面，初使各种团体派出代表列席会议，以破坏向来为武人把持的政局；继由各团体直接选举，使人民更能直接参与政治。”^[17]

在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中，中共赞成国民党的号召，并提醒国民警惕帝国主义宰制中国的新方式——分立或道威斯计划，指出前者比后者更有实现的可能也更加危险；中共还提出国民会议应起到临时政府的作用，“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之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18]236}

在孙中山北上与否的问题上，中共也经历了一个由反对到支持的过程。除了形势变化、共产国际代表的压力、维护合作的需要等因素之外，借机将国民会议的计划付诸实施，是促使中共政策转向的主要原因。

二、国共共同推动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4年11月21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发通电表示要召开善后会议与国民代表会议，随后，北洋政府发布了《善后会议条例》，按此条例规定，能够参加这个会议的，绝大多数都是军阀、官僚和依附于他们的政客，孙中山及国民党也被邀请参会^{[10]4-5}。

段祺瑞表面上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是国民会议组织法由包办善后会议的封建军阀官僚及其代理人讨论决定,显然不可能产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国民会议。段祺瑞召开这样一个代表军阀官僚利益的善后会议,其目的—在于政治分赃,二在于抵制国民会议,而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将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对此,恽代英评价道:“他主张善后会议是‘由各省军民长官’的代表所组织的,这便是一个强盗魔鬼的聚餐会,而所谓国民代表会议的组织法,便靠这个强盗魔鬼的聚餐会中间产生出来。”^[17]

鲍罗廷和加拉罕建议国民党参加善后会议,认为可以利用善后会议宣传国民党行动纲领,孙中山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国民党提出了参加善后会议的前提条件,“如果国民党11月13日宣言中所提到的那些阶级和民众团体的代表参加会议,国民党就参加。”^{[18]556-563}这实际上是对善后会议的抵制,即要么召开国民会议,要么将善后会议变为国民会议。

国民党的这一决定得到中共方面的积极响应,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就国民会议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一,认为国民会议是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撰文指出,“我们为什么赞成国民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无论将来成功或失败,眼前便给我们以民众的政治活动之机会。”^{[19]162-163}第二,认为国民会议由人民的代表组成,代表人民的利益,国民会议符合人民的需要,“此时多数中国国民都要求有一个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来拥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政府都想制造一个官僚政客之国民会议,来愚弄中国人民。”^{[19]181-183}在赵世炎看来,国民会议是一个德谟克拉西的人民会议。第三,将国民会议用作号召民众的目的,只有革命党才配采用,而“靠武力掌握政权者为要借招牌撑门面而以制造拥戴机关为最后手续的,不仅不配采用,且与国民会议之真义站在反对面”^{[11]193-201}。

除了寻求舆论支持之外,中共还在全国各地开展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实质性组织工作。李大钊自苏联回国后,在北方地区广泛动员,领导了北方的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1月3日,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次日,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京大学第三院正式成立,有二百多个团体代表出席会议,来宾逾3000人,并发表成立宣言和章程,李大钊出席大会并作了讲话。”^[20]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也通告全国各省区,号召成立全国性质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地纷纷响应,相继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或筹备处。

各省区和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的骨干和领导人许多是共产党员,如上海的邵力子、俞秀松、郭景仁、刘清扬、向警予、恽代英、赵世炎、夏之栩,山东的王烬美,天津的邓颖超、于方舟,广东的周恩来、苏兆征,江西的方志敏,湖南的郭亮等,这些共产党员在各地广泛地开展活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月中旬,中共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善后会议问题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在大会的宣言中也指出了善后会议的性质,强调要召集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反对善后会议。

孙中山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和广大民众的要求,对善后会议明确表明了反对立场,认为这个会议不能代表全国各党派和各阶层,因此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会议。1月17日,孙中山致电段祺瑞,严厉指责其坚持召开善后会议的做法^{[16]560-562}。

1月19日,中共政治局专门就善后会议等问题作出决议,指示“共产党当使民众向段政府要求,国民会议促成会得派代表参加善后会议,此等代表的人数当占善后会议人数三分之二,此种参加即以阻止段氏计划为目的,并使段氏立即召集国民会议”^{[18]263-264}。

虽然赞成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但中共仍然对国民党是否会妥协保持警惕。维经斯基在《向导》周报撰文,提醒民众注意,召集军阀会议的计划是有日本帝国主义背景的。维经斯基还暗示孙中山不要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当,因为他们对“中国政界的重要人物亦施用思想上的暗侵手段”^[21]。赵世炎在写给《向导》的通信中谈到,“近闻中山左右在同志间宣布两大原则即:(一)绝不妥协;(二)又不决裂。”在赵世炎看来,不妥协就要决裂,不决裂就是妥协,二者间不容发。善后会议与预备会议的争执问题已摆在目前,在事实上已无妥协之可能^{[11]202-203}。

鉴于段祺瑞拒绝对善后会议作根本性改造,善后会议即将成为封建军阀、官僚、政客们的分赃会,根本

不可能解决任何有关国家统一与建设的问题。1月31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也行动起来,推动其全国党员反对善后会议,希望能够促成国民会议的召开。“主张人民自动的举派代表,组织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会于北京,实行监督政府,进而以民众力量解决国是。”^{[10]13}

段祺瑞政府不顾各方反对,逆民意而行,执意要召开带有明显权力分赃性质的善后会议,企图重建封建军阀专权的政治格局。对于这样的做法,国民党与中共都坚决反对。中共对国民党能否坚守立场仍然持有疑虑。尽管存在分歧,但国共双方都赞成尽快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以此作为抵制善后会议的最有力武器,此后中共积极开展活动反对善后会议。

三、反对善后会议中的群众动员

1925年2月1日,由段祺瑞主导的善后会议粉墨登场,中共一方面继续揭露善后会议的黑幕,另一方面加紧推动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善后会议正式开会的当天,赵世炎在《政治生活》上撰文强烈谴责段祺瑞政府的倒行逆施,他提醒民众注意,“军阀是绝对不顾民意的;军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是绝无所顾忌的。胜利的军阀站在统治的地位上,简直是为所欲为;人民反对的事,正是他们要做的事。”^{[11]214-216}

2月14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发表《大家应该开始懂得善后会议的价值了!》一文,对善后会议予以无情嘲讽。“段祺瑞拿数十万民脂民膏,召集一个军阀官僚的善后会议来替他捧场,可算是中国军阀之最后豪举了!”在列举了一系列事实之后,陈独秀宣布,“已表示善后会议完全破产,实更证明以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纠纷之绝对的不可能。”^{[19]198-199}

2月30日,赵世炎在《善后会议中的北方政局》一文中,对善后会议中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予以入木三分的剖析,揭示北方政局乱象。“从表面上看,这三月以来安福系在四面八方用了种种纵横捭阖的政策和欺骗人民的诡计,以图稳固其地位;但实际军阀间之暗斗甚烈,酝酿的问题甚多,迟早必爆发成为公然的争斗。”^{[11]229-232}3月8日,赵世炎撰文直陈“善后会议不能善后了”^{[11]233-236}。

为应对中共反对善后会议的斗争,段祺瑞政府加紧迫害共产党员。时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钊要求司法部京外各机关查获共产党员后,应以内乱罪从严处理。陈独秀发文声讨章士钊,并对司法部的训令提出许多质疑,“先生竟想象军阀官僚的势力能够长治久安的统一中国么?中国在他们统一之下能够得着进行么?”^{[19]200-202}段祺瑞所为不得民心,章士钊的师友章太炎、李根源都加入了反对善后会议的行列。

反对善后会议的最好方式是尽快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2月15日,维经斯基在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信中,敦促“党必须竭尽全力尽快为召开促进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开展选举运动,因为我们现在积极抵制段祺瑞会议,而这种抵制的最好表示就是引起全国公众瞩目的促进委员会代表会议同段祺瑞会议的实际对抗”^{[22]570-571}。

在中共的领导下,各地学生、小商人、工人、农民、妇女等平民团体纷纷加入国民会议促成会,其中产业工人的组织——海员工会、铁路总工会等最有实力。各地劳动民众参加热情高涨,汉冶萍工会主张劳动人民应奋起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这一主张得到广泛响应。瞿秋白评论道,“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最广泛的参加政治的运动。”^[23]

3月1日,在孙中山、李大钊等国共两党领导人的号召与主持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到会正式代表一百余人,列席代表一百余人。”^[24]会议组织过程中,中共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四川代表团即由萧楚女出面组织,代表团一共有10名成员,其中中共党员3人。“共产党人李大钊、恽代英、邓颖超、王烬美、赵世炎、朱务善、刘清扬等参加了这次大会。”^[25]据鲍罗廷分析,“与会代表中有100名是左派。”^{[22]590-594}代表大会历时一个多月,否定了段祺瑞向善后会议提出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讨论了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

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大会最主要的成果是,“指示了人民以国民会议之性质,指示了人民以奋斗的方法,并指示了人民对于各种问题之确切方案。”^{[11]202-203}赵世炎认为本次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样从民间产出的会议,在我国实不易见,或者竟是真正的国民会议之先声。”^{[11]202-203}

由于该会与善后会议针锋相对,遭到当局打压,以至于这个民众性的大集会在北京召开一月有余,而全国知者尚少。赵世炎认为其原因是,“在安福派政府高压之下,该会于开会时常不能自保安危;该会所寄出的会报,多被政府劫留;该会所发表的新闻,载北京占多数的反动报纸,多不予以登载,而对于安福系研究系联络派及军阀所组成的善后会议消息,则逐日连篇累牍的予以登载。”^{[11]202-203}

正当反对善后会议的斗争如火如荼开展之际,3月12日,孙中山因病逝于北京。中共于3月15日发布公告,“号召全国民众,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这些运动的进攻。”^{[18]324-325}4月6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4月21日,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收场,中共反对善后会议的斗争亦告结束。

四、结语

反对善后会议,是中共登上中国近代政治舞台初期,为扫除封建军阀政治,实现民主政治的一次公开斗争。作为一个矢志不渝从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场斗争中,中共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针锋相对,作舆论发动,作组织发起,警惕国民党的妥协,与共产国际代表协调立场,应对当局打压和迫害。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经受了考验,体现了坚定的斗争立场和较高的斗争水平,使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口号更加深入人心,壮大了革命声势,扩大了革命影响,促进了中国民众的觉醒,激发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义愤,推动了革命的发展。中共反对善后会议的历程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中共领导的革命具有正当性。反动派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即便是因内斗出现重大危机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仍然试图抓住手中的权力不放,试图通过各种欺骗手段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在反动派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前提下,他们绝不会通过谈判、妥协的方式,把政权交给人民。段祺瑞借助臭名昭著的善后会议抵制国民会议,即为一明证。中国近代史上,连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议会都没有,也就不存在通过所谓议会斗争走改良道路的可能性。“告别革命”论者没有看到或不愿意承认,革命就其基本性质而言,是扫除历史前进的障碍,没有旧势力的“破”,就不会有新社会的“立”。通过革命方式,推翻反动派的统治,是必然结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不是被制造出来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必然产物。

第二,革命理论是革命行动的先导。中共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纲领,在此之后的革命运动中,中共高度重视用民主革命的理论来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并用这些分析来指导具体的革命行动。在反对善后会议的斗争中,中共团结各方进步力量,在国共合作框架下展开行动,将革命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就是对民主革命纲领的贯彻和落实。中共领导革命的过程,亦是不断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理论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阶级斗争、民主革命等革命话语,成为中共分析中国社会的有力工具、动员民众的有效武器。

第三,革命需要团结各方力量。中共在开展斗争的过程中,始终重视各方力量的作用,既注意协调与国民党、共产国际的意见,又始终重视发动广大受压迫阶级开展联合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诞生不久的中共在开展统战工作时已初窥门径。在群众动员上,中共除了广泛发表文章、开展集会外,还明确要求其基层组织联络人民团体,推动国民会议促成会。在活动中,中共不仅锻炼了其群众动员的能力与水平,更促进了人民的革命意识新觉醒,在群众动员中壮大了自身的影响力,提高了普通民众的革命意识与认知。反对善后会议也成为中共开展全国性统战与群众动员的一次预演,此后其开展统战与群众动员工作的技能日益娴熟,成为其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四,革命需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既应保持革命的激情,又应具备革命的理性。成立不久的中共,在斗争中较好地保持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一方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坚决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而且自始至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无论其他政治力量是否有参与权力分配的考量,对中共来说,反对善后会议的斗争就是一场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战线分明、目标明确,中共没有也不可能以妥协退让换取政治利益的余地,即便成为封建军阀政府迫害的主要对象亦毫不退让。另一方面,中共与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维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立场鲜明,虽有分歧,但不决裂,在斗争的每个阶段,能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与盟友尽量保持一致。中共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阶级属性决定了其坚持以谋求全人类的解放并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在使命践行上,中共坚持目标导向,体现鲜明的崇高性;在实现目标的策略上,中共能做到实事求是,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近些年所盛行的现代化叙事,以今天的视角去苛责近代革命者,显然并不如其所宣扬的那么客观,只有回到历史现场,才能够还原历史本貌,给革命者以公允的评价。将中共反对善后会议的斗争置于革命历史进程中予以考察,可以说明,革命叙事仍然是探究、表达中国近代历史的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 [1] 孙彩霞.军阀与善后会议[J].近代史研究,1989,(6):165-173.
- [2] 华友根.略论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条例》与《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的纷争[J].安徽史学,1990,(2):58-62.
- [3] 张书克.胡适与善后会议[J].史林,2016,(3):135-141.
- [4] 吴元康.孙中山何时公开反对段祺瑞善后会议[J].安徽史学,2000,(1):76-80.
- [5] 杨天宏.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J].近代史研究,2000,(3):95-116.
- [6] 刘敬忠,王文玉.胡憨战争与善后会议[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28-32.
- [7] 胡晓.段祺瑞与善后会议[J].安徽史学,2004,(3):84-89.
- [8] 黄亦君,李晓兰.《现代评论》与善后会议[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9,(4):49-58.
- [9] 龙健.中国共产党与善后会议[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4):62-66.
- [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善后会议[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 [11] 赵世炎.赵世炎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2]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卷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52-153.
- [13] 彭述之.北京政变与投机无耻的公团之请求[J].向导周报,1924,(89):738.
- [14]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91-695.
- [15]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三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30-31.
- [16]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卷11)[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7] 恽代英.恽代英文集(卷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96-602.
- [18]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19]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卷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0]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卷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8-49.
- [2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卷2)[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671-673.
- [2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卷1)[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
- [23]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卷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61-168.
- [24] 王一平.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史实辨析[J].北京党史,1992,(2):62-63.
- [25] 危石顽.我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50.

(责任编辑:颜莉)